

目 录

前 言

回忆解放革命历史名城——遵义·····	陈璞如 (1)
挺进黔北纪行·····	卢彦山 (17)
赵健民同志谈争取贵州国民党将领陈	
铁等人的一些情况·····	刘建等 (21)
遵义解放初期的接管工作·····	李程 (25)
黔北起义部队的改造——访李程同志·····	刘建 (37)
解放前夕我为 275 师送信的经过·····	陈英 (46)
275 师起义的前前后后·····	熊先煜 (49)
改造 275 师片断·····	黎涌萍 (54)
改造起义部队点滴回忆·····	李保成 (60)
贵州第二绥靖公署的成立及其起义·····	刘宁 (64)
国民党 89 军独立第六旅起义经过·····	徐文仲 (69)
国民党 328 师起义始末·····	邹亚平 (79)
孙合彬、李金亚谈改造 328 师片断·····	刘思济 (96)
忆保安十三团起义·····	周梦生 (107)
一场特殊的战斗——改造国民党内政	
部第二警察总队记实·····	李春生 邹亚平 (113)
陈铁的东北之行·····	朱振民 (122)

回忆解放革命历史名城——遵义

陈 璞 如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委发出关于做向好大西南进军准备工作的指示。九月初，赣东北区党委书记徐运北在江西上饶传达了党中央指示：“赣东北区党委随同二野五兵团西进，成立贵州省委，解放和接管贵州。”由申云浦同志逐个分区进行了动员。九月四日，我五兵团从江西上饶出发，十月中旬各部先后进入湘西。十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决定，在湘潭确定了中共贵州省委员会的人选。与此同时有一千七百余名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在邵阳，新的贵州省委和二野五兵团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了解放和接管贵州的方针和任务。根据中央的指示，当时对旧政权的接管政策是“接过来，包下来，逐步改革。”会上研究分析了贵州的情况，明确指出：接管要包下来，但必须坚决打击负隅顽抗的残余匪帮和顽固势力，认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争取分化，扩大团结面，搞好接管工作。主持这次会议的是苏振华、杨勇和徐运北同志。会上还传达了中央指示，明确陈曾固同志为省委副书记。会议决定原冀鲁豫二地委、五地委的干部加上三地委的部份干部进入遵义地区。原来，我是分配去接管贵州的毕节专区，后因工作需要，省委决定我

去遵义担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和苗春亭、海燕、李苏波、李程、李公俭等同志组成遵义地委。遵义是黔北重镇，地处川黔交通咽喉，位置险要，这里历史上开发较早，是黔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保证了长征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我们回顾和学习了“遵义会议”的光辉史篇，从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顽强战斗精神中得到启发和鼓舞。大家斗志昂扬，决心完成“新长征”的任务。

在芷江，遵义地委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省委指示和接管方针；又进一步研究分析了遵义地区的情况，统一了认识，增强了搞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为了有益于开辟贵州新区的工作，省委特别指示我们要携带足够数量的银元和食盐。

我们进入贵州境内，首先感到山多坡陡，地瘠民贫，劳苦大众解放前遭受了超经济剥削，城乡破产，百业凋敝，工农群众，衣衫褴褛，面黄饥瘦，挣扎在死亡线上。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贵州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渴待解放。十一月十日，解放黄平县后，我们遵义地委就在黄平中学召开了向遵义进军的动员大会，分析形势，交代政策，鼓起斗志，加速行军，争取早日解民倒悬。全体干部和战士立即响应党的号召，精简了行装，加快了步伐，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当时，道路因迭遭破坏，又逢连日阴雨，泥泞难行，但同志们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持行军。大家发扬互助精神，互相谈心，鼓舞斗志，同志们的歌声时起

时伏，豪情满怀。记得到了黄平，我住在农民家，苏振华和杨勇同志找我和李程到他们那里，要我们直接去遵义，不再绕道贵阳。我们原先考虑到干部队伍太大，武装太少，有些耽心，怕受损失。杨司令员说：“三兵团的十军在杜义德同志率领下已接近遵义，我军很快就要解放遵义。他们将乘胜向四川前进。我军所向披靡，敌军闻风而逃。你们可直接去遵义，尽快同十军联系，做好解放历史名城的各项工作。”苏政委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势如破竹，但考虑到不使你们庞大的干部队伍受损失，决定从我们带的一个连里拨给你们一个排。”后来，又增派了五兵团随营学校支援我们，同赴遵义。

我们冒着大雨进军到余庆县的箐口地方，看到乌江对面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沿途都是敌军的散兵，还在拉伕、抢劫、残害百姓，面对这种情景，干部战士无不义愤填膺，恨不得横刀跃马冲杀过去。可是滚滚的乌江挡在面前，对岸还有国民党四十军陈春霖残部。据俘虏说：“我们听到刘邓大军兵分两路：一支从鄂西入川，一支从湘西入黔，知道后路已断，虽有乌江天险，也无法阻挡，全军就崩溃逃散了。”

箐口的山崖上，当年红军写的大字标语依然可见。革命标语耸立山头，象红军高大的形象一样鼓舞着我们前进。乌江边的船被反动派掠走和破坏，细雨濛濛的江岸竟找不到一艘船。为了抢渡乌江，同志们不顾行军劳累，立即四处找船。不久就找到了一只小船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艄翁。他七十多岁，当我们说明我们是毛主席、朱总司令指挥的解放军时，他和我们紧握双手，激动地说：“当年红军渡乌江，我就给他们划过船！”这位老人又去喊儿子来帮忙划船，从早

到晚，一船船地往返运载干部和战士渡过了乌江。我们送给他三块银元，经再三说服，才肯收下。

渡过乌江后，即到达湄潭县，地委决定张军直同志留在湄潭任县委书记，我们继续前进，直奔遵义名城。

当五兵团大部队直趋贵阳的时候，三兵团的第十军已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解放了遵义，入城部队是二十八师。地委干部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遵义后，连夜开会研究，将派往黔北各县负责接管的干部安排出发，开辟工作。第三天，遵义市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我任主任，出了安民告示。遵义大街小巷，锣鼓喧天，呈现出一派热烈庆祝遵义解放的沸腾景象。

我们和十军政治部主任许梦侠以及二十八师负责同志高世平见了面，他们详细介绍入城情况后，就马不停蹄经赤水继续入川，断敌后路。留在遵义地区的部队很少，实际上我们在遵义摆的是“空城计”，但是我们的力量是不能用部队的人数来衡量的，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基本群众是我们的依靠力量，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跟上。首先，我们热情地和地下党的同志会师，和进步人士促膝谈心，详细了解遵义的历史情况，赞扬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迎接解放的斗争。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和党在遵义一带影响很大，播下了革命火种。许多伤病员和掉队人员，流散在遵义地区。他们在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怀念党、怀念红军，在群众中作了不少宣传工作。遵义附近有红军坟，在白色恐怖下，经常有人去扫墓，悼念烈士。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这些红军战士在遵义地区解放的时候都起了应有的作用，十二月二日在遵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了会师大会。对于地下党员、干部和

进步人士。本着信任、使用的原则，安排了工作。如当即安排了遵义的杨天源任遵义县副县长，湄潭县的何恩余任湄潭县副县长，从川东来凤冈的向国灵任地委副秘书长，川东的温凯庭到省工作。在凤冈还有一位黄涛同志，他现在国家体委工作。地下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组织“曙光社”的社员，根据中央和西南局关于地下社、盟转团的有关文件指示，全部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以地下团员幸必泽为副司令员、进步人士潘名挥为政委的“川黔边区纵队”的武装人员，一部份编入解放军主力，另一部份分散整编入遵义、仁怀、绥阳等县大队，赤水县的地下党人员亦就地作了安排。并安排了长期与我党合作的进步知识分子陈福桐为遵义市政协副主席，潘名挥到贵阳师范学院筹办艺术科，任副教授兼科主任。他们和新联系的进步群众都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积极参加了遵义地区的接管工作。

遵义解放前，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又经过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积极活动，争取了原国民党贵州第二绥靖区（包括遵义、铜仁地区）司令吴剑平、副司令柏辉章、二七五师参谋长兼遵义留守处主任李益昌、军警宪联合稽察处主任李厚德等率部起义，还有原国民党四十四军一个加强营和遵义县警察局全部员警起义。在我辽沈战役取得胜利以后回遵义家乡的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也宣布起义，并写信给国民党二七五师师长陈德明劝其弃暗投明，陈德明亦在鸭池河宣布了起义。临时被推任为“剿联防指挥部”指挥长的张肇奎也投向了人民。原国民党“东北剿总”高参朱振民，在辽沈战役中投诚后遣散回遵义，国民党企图杀害他，他与我地下工作人员联系，受到保护与鼓励，

此时也现身说法，积极宣传我党政策。

我红军长征过贵州后，蒋介石的中央势力入黔，逐渐形成以“贵州企业公司”为中心的官僚垄断资本，它主要是控制省级机构，但在地处交通要道的主要城市中也有相当影响，广大农村则仍为地方封建政治势力所统治。我们进入遵义后，立即召集国民党中央系和地方系为代表的“遵桐派”上层代表人物如陈铁、吴剑平、王家烈、何知重、杜叔机、谭星阁、侯之桀、周沆等开会，阐明革命形势和党的统战政策，晓以大义，鼓励他们立功赎罪，取得人民谅解。同时，地委和分区决定在分区政治部设立联络处（派分区保卫科长杜芳义负责办公室工作），继续进行争取、分化敌军工作，广泛开展“叫夫、叫友、教子”活动，敦促亲属迷途知返，归家团聚，投诚报到。另外，随我十七军来到贵州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陈又新，与陈铁、王家烈等均属故交，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派陈又新到遵义做陈铁的工作，并带来董必武的亲笔信。董必武同志的信中说，陈铁可以争取。徐运北同志打电话给地委，要我们保持清醒和警惕。地委安排了他们宴会叙旧，互相勉励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原国民党宋希濂集团的二二七和二二八两个团，由鄂西、川东溃退到正安、务川一带。经过侦察，地委决定由陈彬、梁子庠带领遵义青年十儿人前往正安、道真，采用政治攻势解放这两个县。溃窜来的两个团是陈德明的族兄陈鉴明率领的。我和李程同志研究同意陈德明的建议，由他写一封亲笔信，派原国民党二七五师参谋长熊先煜和陈彬、梁子庠一道出发，去做争取瓦解工作。他们在正安和朱振民等会面后，了解到这两个团是河南南阳一带的还乡团收编成的，成

份复杂，但装备较好，经过几天谈判，问题顺利解决。我们保障他们投诚后的生命安全，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愿留的到四面山整顿，编入警卫团。分区还收缴了国民党交警队一部份人的武器。这些人在集中学习后都作了妥善安置。

接管工作之所以开展得比较顺利，主要是由于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军事上取得伟大胜利。我们紧密依靠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使广大人民热烈拥护和支援我们。同时，由于原地下组织主动配合，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了敌人。我们认真执行了接管政策，对开展工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接管之初，我们传达和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决议指出，党的工作重点已由乡村移到城市，我们要一步一步学会管理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任务就是依靠工人和基本群众来从事生产事业和市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是新问题，必须从头学起。但是从黔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重视广大农村的工作，还要有城乡结合的观点。如果放松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采取“单打一”的做法，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城乡接管，首先是铺摊子建立机构，先城镇后乡村，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和干部力量，有步骤地建立人民政权、紧迫地开展征粮支前、安定社会秩序、收缴武器等工作。并按政法、工商、文教、财政、民政、军事等系统，分别进行接管，开展工作。

我们接收的是一个财竭民困的破烂摊子。存在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接收下来的大量原国民党军政公教人员，首先必须养起来，而后才能对他们进行有计划的安置与转业；被匪特骚扰破坏的交通和生产要恢复，物资交流停滞，税收

减少。面临这成堆的问题，陈云同志及时向全国指出：财政困难，物价波动，是伟大的军事胜利后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物。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支出猛烈增加，而国家收入则有待于恢复，入不敷出，不能不依靠发行大量钞票来弥补，而不能不造成币值下跌。但这种入不敷出，依靠发行，以致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现象，完全是暂时的，完全有办法克服的困难，与国民党灭亡过程中的困难完全不同。一切对财政问题的悲观思想都是没有根据的。大约在一九五〇年二月间，省委在贵州解放后第一次地委书记会上作出决定，要加强对敌斗争，开展统战工作，恢复生产，征收公粮，保障供给。我们遵照省委关于开源节流的指示，努力克服困难，狠抓征借公粮和税收，开展金融贸易工作，武装护运，疏导物资交流；同时，核定人数，增产节约，紧缩开支，稳定物价。同志们生活艰苦，工作繁重，日以继夜，不辞劳苦，不怕牺牲，积极开展新区的接管工作，大家朝气蓬勃，工作效率很高。不少同志一开展工作就与匪特的骚扰破坏作艰苦的斗争，有的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如遵义县鸭溪区委书记王裕民遭匪伏击，在顽强战斗中和小通讯员一同牺牲；区队指导员张培然下乡途中，被身边留用的旧乡丁打死，由江西广丰随军西进的新干部吕敷成，被匪特残酷地砍断四肢，宁死不屈，英勇牺牲；汤学敏在与匪徒搏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些先烈的光辉形象至今犹历历在目，他们同所有革命烈士一样是永垂不朽的。那时候粮食确实来之不易，每得一部份粮食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为了支前，为了站稳脚跟，我们依靠群众前仆后继，坚决完成征粮和税收任务。

我们接管文教部门之后，即组织各中小学迅速恢复，按

时开学。我们还接管了原“民铎日报”印刷厂，改组创办了《遵义新闻》报社，宣传党的政策。

与此同时，我们对遵义会议旧址采取了积极妥善的措施，认真加以保护。

经省委批准，遵义市、县分建，派江平鲁任遵义市委书记，辛墨林任遵义市长。一九五〇年二月即召开了遵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时成立了遵义市政协协商委员会，选举江平鲁为主席，陈秀生、陈福桐、牟贡三、张肇奎等为政协副主席；还建立了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我们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克服困难，迅速恢复生产和开展各项新区工作。同时，还迅速成立了新型的工商业联合会代替旧商会工作，任命了银耳商罗俊才为主任。又组成禁烟禁毒、公债劝募、私有款产清理等委员会，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团结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力量，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动了各项工作。

我们进入遵义的初期，各种残余反动势力慑于我军声威，暂时隐蔽下来，但他们暗中串连，窥测方向，图谋按原定的“应变”部署进行反扑，发动叛乱。不久，谣言就逐渐增多，如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台湾反攻大陆已在广东、福建登陆。”等等；遵义闹市半夜起火；在地委领导干部所住的郭家公馆，匪徒黑夜开枪袭击；元宵夜，地委苗春亭、海燕和专员李苏波先由石磴便桥过河上街，回来时提高了警惕，临时改走大桥，一个警卫员仍过便桥，遇匪伏击打黑枪，被打穿了棉衣。恶霸地主罗徽五纠集匪特组成“平黔军司令部”，由原遵义县保警中队长漆文彬当总司

令；原遵义警察局巡警队长则充当了“反共救国军黔北分区”总司令；还有在绥阳、遵义边境打家劫舍的惯匪雷三，自称“川湘黔鄂反共救国军第一路军第九纵队司令”；一部分原起义部队与伪乡保武装相继叛变；匪朱寿组织“遵桐绥边区游击军独立团”；在乌江刀靶水一带扰乱的宋泽、晏子高等啸聚匪徒残害百姓。土匪数量渐次增加，遂形成全地区以至全省性的匪乱。他们公开提出“抗粮”、“保烟”等反动口号。这些政治性土匪中不少是旧官僚、恶霸、特务和国民党党棍。如凤冈县参议长史肇周、绥阳县参议长樊其书与匪吴登仁勾结，成立“川黔湘鄂反共救国军”，各任正副总指挥；国民党三二八师的团长蔡世康同瓮安的匪首吴汝洲、文玉君相勾结，组成“中国人民自救军”；道真县参议长黄守瑛，纠集四川逃窜来的伪专员一起叛乱。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四日，五兵团杨勇司令员在参加成都战役后，率兵团指挥机关胜利归来，途经遵义县刀靶水时遭匪伏击。杨司令员亲自指挥回击，将匪击溃。二月份我西南军区七十三辆卡车，满载粮食、服装等物资，进入松坎、“九盘子”，遭到“川黔边区反共军游击第四纵队副司令”张华清匪部一千多人的伏击与拦劫。省军区尹先炳副司令员组织押车战士奋勇还击，驻松坎的杨秀云机炮连火速赶到，土匪系乌合之众，遂四散逃窜，击伤击毙土匪几十人。

在我大部队入川未回之际，地委大胆使用陈德明率领起义的二七五师，经教育、整顿后，由分区参谋长刘正麋指挥一个团，清剿并擒获了负隅顽抗的湄潭伪县长葛天乙；由分区政治部主任任涛指挥一个团，清剿遵义、桐梓边区和川黔公路上遵义地段的股匪；陈德明任分区副司令员，率一部

份军队驻遵义城郊，协助城防。与此同时，湄潭县消灭了金盆乡恶霸彭文龙匪部。局势渐趋稳定。其间绥阳县城曾一度被樊其书为首的匪众团团围住，县委书记王文、县长张予清临危不惧，据城坚守。正巧，解放军有个班到绥阳去接原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张涛的家属，在还击土匪战斗中，这个班起了很大的作用。土匪围城时，还有个农民主动跑到遵义来向分区副司令员孙大坤报信告急，我们热情地款待了他，并奖给他银元。随即我们派人率领起义的官兵三百多人，整装列队，荷枪实弹，前往解围。匪众见了，惊慌叫嚷：“不得了！老八路来了！”争相逃窜，不击自溃，遂解绥阳之围。

一九五〇年一月，邓小平，刘伯承同志曾严肃指出：“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里还掌握武器。”又说：“这个斗争是极端复杂的，表现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而且还包含着流血的斗争，例如剿匪和对付可能发生的报复”，我们“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还要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规定了“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具体政策，号召新解放区的军民立刻转入剿匪斗争。西南局及时指示我们：“西南封建势力原封未动，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各阶层人士所热烈拥护的，要求西南全党全军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剿匪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要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我十六军在川西会战消

灭国民党残部之后，回师黔北，军部驻遵义市。西南局、省委决定我任地委第一书记、分区第一政委。十六军负责同志杨俊生兼分区司令员，陈云开任地委第二书记、分区第二政委。根据西南局指示，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军队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缩短战线，集中兵力，重点合围，打击中心区的股匪，确保川黔、滇黔和黔桂公路交通。春末，上级为了集中一部份机动部队，以加强交通沿线及中心地区守备力量，也是为了实行对重点的重兵进剿，决定撤出边缘地区的二十三个县。遵义地区撤出了务川、正安和道真等三个县。经过六月的东线合围；七月的西线合围；九月的务、正、道地区合围后，再将主力部队组成大小不同的各种形式的武装工作队，更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了空前强大的政治攻势，这样，整个形势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月中旬，分区决定组织一个遵义剿匪指挥部，由顾延邦（作战处长）任指挥长，何志强（机要处长）任副指挥长，刘成斌（随校一大队副政委）任副政委，政委由遵义县委书记丁润桥兼任，加强了遵义县的对敌斗争。同时地委决定建立统战工作性质的特殊机构“遵义专区剿匪委员会”，由我担任主任，杨俊生等为副主任，委员有李苏波、陈德明、朱振民、杜叔机、张肇奎等，秘书是晏东英，并派市委宣传部长俞百巍在这个委员会里负责实际工作。

当匪特蠢蠢欲动之际，陈铁回到他的家乡遵义县西坪村，他的亲弟陈永祥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当时在二七五师任副师长。陈永祥坚持反革命立场，打着陈铁的旗号进行叛乱，企图裹胁团溪附近的群众为匪。陈铁被他们控制在西坪村。因为陈铁在晋东南发生磨擦时，是统战对象。任东北

剿总副司令时，在辽沈战役中打了败仗，已经退避家乡。蒋介石许他八个番号的编制，要他重整旗鼓；后来又劝他去台湾，陈铁推说有病，没有跟随去台湾。我们根据省委指示，对陈要继续做工作。为此，地委决定先由分区副司令员李程带一个连，亲自到西坪访问了陈铁，看见陈永祥在当地修了工事，但没有其它行动。这次商谈没有结果，接着，地委又派人同侦察科长吴震带一个班到团溪，在团溪镇上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当天晚上，吴震同志带侦察人员到镇外巡视，有人认识陈永祥，见他纠集一些匪徒在山坡一间农舍里开会。我们遂将农舍包围，打了几枪，冲进屋，在现场活捉了陈永祥，将他押送到遵义。陈铁不明真情，听见枪声，慌忙跑出家中而扭伤了脚。我们通知陈铁到团溪参加各界座谈会，他派陈鉴明为代表来参加座谈。最后，在西坪同陈铁见面时，我们告诉他：“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希望你迁往遵义城里。”并告诉他，人民政府将以起义将领对待他，陈铁表示伤愈后就迁往遵义城里。后来地委又派统战部的俞百巍、晏东荅二同志专程探望和迎接陈铁。最后，陈铁终于举家迁往遵义城里。

杨勇同志第二次路过遵义时，分区宴请了起义将领与杨勇主席晤面。不久，上级任命陈铁和王家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继而又任命陈铁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林业部部长，王家烈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任命吴剑平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民政厅副厅长。何知重到贵阳后，任贵阳市人民代表，朱振民留遵义任专署民政科长。

遵义旧帮会人数较多，剿匪委员张肇奎是袍哥大爷，通过他出面而劝说，可以影响匪众里的“兄弟伙”回来。我们

建议剿匪委员会研究后，派人去做工作，要张肇奎出面通知东南西北四区乡镇里的“兄弟伙”来遵义工商业联合会聚餐商谈，张肇奎起初有顾虑，误认为是人民政府怀疑他通匪，逼他走这“一步棋”。经过耐心解释，晓以大义，他才乐意下帖请人来赴宴。

那次一共来了一百多人，会上，我们劝勉他们要认清形势，早日弃暗投明，携枪投诚，人民政府不管既往，各自可以国家安居乐业。经过一番号召，先后携枪投诚和自动报到，填表自新的，总共三百多人。同时，地委、市委又派汤之驹、辛必达等同志开办了一个“自新人员训练班”，进行政策宣讲，以及形势、守法教育。

我十六军回到遵义后，地委根据敌情重新部署，有重点地集中兵力对残匪进行围剿、追剿。如有匪情，不受县界、省界限制，跟踪追击，穷追到底。并继续利用地方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分化瓦解敌人。有一次，朱振民和潘名樾随解放军一个营进驻高坪，围剿高坪、山盆、李梓一带的土匪，途中遭匪袭击，朱振民在卡车上被匪掳往山盆，他以“朱大爷”的袍哥身份喊话，进行教育，结果他回来时，还带了几个为匪的原乡镇长缴械投诚。遵义分区还组织了便衣队，也叫武工队，机动灵活，神出鬼没，捣毁了不少匪巢。顽匪罗徽五、卢杰都是武工队打伤俘获的。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贵州军区部署了瓮安、余庆、湄潭三县交界匪区的铁壁合围，活捉了匪三二九部队野战副司令王福堂，七月十日合围胜利结束，歼匪王福堂以下三千一百七十二名。从此，各地残余匪徒惶恐逃窜。下半年又彻底消灭了史肇周、蔡世康等匪特武装三千五百名，收复道真、正安、务川。十一月五日黔东

北合围结束。剿匪工作在遵义地区取得全面胜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剿匪过程中，工人、农民始终是和我们心贴心的。他们不辞劳苦，日夜奔走联络、护送、侦察；有的冒着生命危险，向我们通风报信；也有本人被杀害，家属继续为我们工作，并要求我们替他们报仇雪恨。很多无名英雄，为人民立了大功，却从来不居功自傲。例如：遵义郊区的农民陈玉河，他侦察匪部的人数、番号、枪支和出没地点，用符号代替画在纸片上，又将纸片装在当拐杖的竹竿里，带来向我们汇报。土匪扬言要杀他全家，我们将他小孩接进城，他夫妻俩仍坚持走乡串寨，继续送情报给我们。

当时，宋任穷同志曾路过遵义，要求我们重视新区的工作，善于研究新问题。他强调：接管一定要包下来，斗争中要孤立少数，打击最顽固的，指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遵义地委根据省委要求建立了统一战线工作部，对于当地在文化、工商各界有声望的人士，都由市委分别安排为政协委员或人民代表。同时，对于一些与匪勾结，散布谣言，阴谋颠覆人民政权，坚持反动立场的匪特和反革命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和镇压。通过调查研究，经上级批准，于三月二十四日晚上统一行动，逮捕了一百多人；又区别情况，一个一个认真作了应有的处置。这样做，体现了政策，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进一步安定了社会秩序。

革命历史名城遵义的解放、接管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后，一九五〇年秋，我调省工作，由裴志耕同志接任我在遵义的工作。回忆在遵义工作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当时新的历史条件下，地委曾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和问题。但是，由于认真贯彻了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正确方针政策，遵义地区的各级干

都坚持党性原则，加强团结，发扬了艰苦的独立工作精神，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勇于实践，及时总结，不断克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撰写这篇回忆录期间，我脑际时时浮现出当时为解放和接管遵义而奋斗的广大干部、群众那种革命朝气，浮现出许多为解放事业光荣牺牲在黔北山区的烈士们的音容笑貌。通过回忆这一段革命斗争历程，我们将更好地继承革命传统，发扬革命传统，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努力奋斗。